

网络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建议

——基于粤西B村的过程追踪

宁 飞, 陈美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8日

摘 要

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下,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政府热、群众冷”的现实困境。研究选取粤西M市A街道B村雨污分流改造项目作为典型案例, 基于网络治理理论视角, 采用过程追踪方法, 整合半结构访谈、项目档案与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多元证据, 系统剖析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由“分歧”转向“协同”的演进逻辑与实现机制。研究表明, 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结构条块化与治理机制失灵是导致施工协调不畅的主要原因; 通过实施“主体补位 - 结构重塑 - 机制再耦合”的系统性干预策略, 镇村两级有效推动了村民由“意见分歧节点”向“协同治理节点”转变, 实现了支流水质由劣V类显著提升至IV类, 村民满意度提高63个百分点。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场景下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的再耦合机制, 也为同类农村环境治理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操作的政策执行路径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村污水治理, 网络治理, 多元共治

Network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the Dilemmas and Pathway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Process Tracing Study of B Village in Western Guangdong

Fei Ning, Meizhao Che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ugust 3,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26

文章引用: 宁飞, 陈美招. 网络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建议[J]. 现代管理, 2026, 16(9): 55-63.
DOI: 10.12677/mm.2026.169198

Abstract

Under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government is enthusiastic while rural residents are indifferent” commonly exis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olicies. This study selects the rainwater and sewage diversion renovation project in Village B of Sub-district A, City M, in western Guangdong as a typical c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governance theory and using the process-tracing method, it integrates 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 includ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project archives,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multiple actors shift from “divergence” to “collaboration”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governance actors, fragment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dysfunc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coordination difficulties i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actor replenishment-structure reshaping-mechanism re-coupling” by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villagers were transformed from “nodes of disagreement” into “nod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transformation contributed to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ributary water quality from Grade V (inferior) to Grade IV and a 63-percentage-point increase in villager satisfaction. The study not only reveals the re-coupling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ly led network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ut also provides a replicable and operabl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athway reference for similar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ject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ewage Treatment, Network Governance, Multi-Agent Co-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¹,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制度遵循。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日益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农村污水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环节,不仅关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也直接影响到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公信力。

然而,在基层的具体操作层面,常陷入“政府在做,村民在看”甚至“政府推进,村民不配合”的尴尬局面。以粤西地区M市A街道B村为例,在污水治理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村民与政府之间协调不统一的情况。

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既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包括技术适配与资金缺口[1][2]、督察压力与行政调度[3]、制度碎片化与话语错位[4]等方面。但对于强政府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模式如何从分歧局面走向协同共治的过程缺乏细节深描。本文引入网络治理理论,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者视为平等节点,强调“主体-结构-机制”三维耦合:主体层面关注节点是否有效参与,结构层面检视横向连接是否建立,机制层面判断信任、价值、信息、动员四链是否畅通。网络治理理论视角的价值在于:第一,可将B村从“分歧”到“协同”的转变转化为检验网络再耦合的完整过程,使个案描述升级为理论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2/05/content_5655984.htm

验证；第二，能用“网络密度、连接强度、四链耦合度”等可测变量，为农村污水治理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操作的诊断与修复参照；第三，有助于弥补既有研究对“微观互动－结构重塑”机制关注的不足，拓展网络治理在中国乡村振兴场域的适用边界，为基层政府跳出“单向管控”困境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和对策思路。

2. 文献综述

2.1. 农村污水治理政策执行研究：从结构困境到过程互动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污水治理政策逐步由早期“统一建设、自上而下”的模式，转向“分区分类、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1]。学者将现有治理模式归纳为三类：政府包揽模式、PPP 模式以及村民自建模式。前两者虽在短期内见效快，但在后期运维中常因责任不明、资金断链而陷入“重建轻管”的困境；村民自建模式虽能提升参与感，却普遍面临技术支撑不足与长效监管缺失的挑战[2]。这表明，单一治理主体或简单协作模式难以应对农村污水治理的系统性与复杂性。针对农村污水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有学者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了系统探讨[5]；不同技术模式的适用条件与政策配套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6]；已有研究对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的政策框架进行了深入解读[7]。

梳理文献发现，既有研究多从技术、资金、制度与社会四维视角剖析政策执行困境：包括管网设计与地貌脱节、县级财政配套不足、部门管理碎片化，以及环保专业话语与村民日常生活话语之间的认知错位[3][4]。这些研究在宏观层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结构－制度”解释链，尤其强调了行政压力、督察机制与资源约束对政策落地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研究开始将“冲突”纳入分析范畴，指出当征地补偿、基建配套等历史承诺未能兑现，且村民缺乏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时，治理过程可能从“政府推进、村民观望”迅速恶化为“协调不畅－施工停滞－再谈判”的循环僵局[8]。此类研究将冲突视作可观察的治理变量，揭示了情绪积累、信任崩塌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动态关联。

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多数成果侧重于宏观结构成因或冲突事件的“引爆点”分析，对日常互动如何逐步累积为抵制情绪，又如何通过具体机制实现“分歧－协同”的急剧逆转缺乏细致的过程追踪；第二，尽管指出了“动员不足”、“沟通不畅”等问题，但对其背后的网络联结断裂、信任机制缺失、价值认知错位等深层机理未能进行系统性解构；第三，现有分析工具难以对治理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关系结构与机制耦合进行可观测、可测量的动态刻画，导致政策建议多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可操作、可复制的治理参照体系。

上述研究缺口，恰为本文引入网络治理理论提供了切入空间——该理论不仅关注“谁在治理”，更重视“如何联结”、“何以协同”，为解读微观互动如何引发结构变迁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2.2. 网络治理理论：从静态结构到动态过程的机制拓展

网络治理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旨在回应“市场失灵”与“科层失效”的双重治理困境[9]。其核心在于跳出“政府－市场”二元对立，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视为平等互动的“节点”，通过构建横向联结、信任协商与资源互赖的网络结构，实现协同治理。该理论强调“主体－结构－机制”三维耦合：主体维度关注节点的角色与资源；结构维度考察节点间的联结方式与网络形态；机制维度则聚焦信任、价值、信息与动员四链是否畅通并相互强化。

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网络治理呈现出“行政主导型网络”的鲜明特征[10]。政府仍扮演关键节点角色，但其有效治理依赖于村委会等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若中介节点功能弱化，网络密度将急剧下降，信息与资源流动受阻[11]。近年来，国内学者进一步将网络治理机制操作化为四链分析工具：信任链关注

历史承诺是否兑现; 价值链检视技术话语能否转化为村民可感知的生活意义; 信息链比较官方传播与民间舆论的效力; 动员链则评估利益诉求是否有制度化表达渠道[8]。这为观察农村治理中的合作与分歧提供了细腻的微观视角。围绕网络治理的理论演进与本土化应用, 学术界也展开了系统的梳理与反思[12]。

尽管如此, 既有网络治理研究多侧重于静态的网络描述或单一时点的机制分析, 对网络“断裂-修复-重构”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仍缺乏系统追踪。尤其是面对“分歧-协同”的剧烈转折, 现有理论尚未充分回答: 节点间互动频次如何影响信任重建? 横向联结的修复是否先于价值共识的形成? 四链修复是否存在时序逻辑或关键抓手?

2.3. 研究推进: 从描述到解释, 从框架到工具

综上所述, 农村污水治理研究已形成“宏观结构深描”与“冲突事件鲜活呈现”的双重特色, 共识性地指出技术、资金、制度、社会四重困境, 并敏锐捕捉到“承诺-信任-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5]。然而, 从日常互动到集体行动, 再从僵局转向协同共治的“过程黑箱”仍未充分打开。具体而言, 既有研究未能系统揭示: 微观层面的节点排斥、联结断裂与机制失调是如何逐步叠加并导致网络崩溃的? 又如何通过有序的节点激活、结构重塑与机制再耦合实现网络重建?

为此, 本文引入网络治理的“主体-结构-机制”三维框架, 并尝试在以下方面推进研究:

第一, 将理论框架操作化为可观测的测量指标。采用过程追踪法, 逐日梳理 B 村雨污分流项目从施工受阻到协同完工 46 天内的互动事件, 提取节点互动频次、横向连接数量、四链耦合程度三类指标, 实现治理过程的动态描述。

第二, 揭示“分歧-协同”转折的微观机制与时序逻辑。通过对比四链断裂与修复的完整序列, 本文试图回答: 是信任重建优先, 还是利益疏导先行? 节点补位与结构重塑何为前提? 从而提炼出可复制的“网络修复路径”。

第三, 构建农村环境治理的“网络治理工具箱”。在机制解释的基础上, 本文拟提出包括“节点补位清单”、“联结重建路径”、“四链修复策略”在内的操作指南, 为基层政府提供从诊断到干预的系统性治理支持。

通过上述推进, 本文期望实现从静态网络描述到动态过程解释、从理论框架构建到治理工具交付的双重跨越, 不仅拓展网络治理理论在乡村振兴场景中的解释边界, 也为破解“政府急、群众冷”的基层执行困境提供可复制、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3.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单案例过程追踪法(Qualitative Process-Tracing), 聚焦于 B 村雨污分流项目从“协调僵局”到“协同共治”的动态演变过程。该方法遵循“时间序列 + 因果链”的逻辑进路, 通过深描关键事件、主体行为与网络互动在时间轴上的展开, 系统检验“四链断裂→网络再耦合→水质改善”这一核心机制链条是否成立[13]。过程追踪法擅长揭示微观行为如何通过反馈、累积与互动引发宏观结构的变迁, 尤其适合回答本文关注的“断裂如何形成、修复如何发生”等机制性问题。过程追踪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已被确立为案例研究的重要方法[14]。通过对 46 天关键期的逐日事件编码与阶段比对, 本文致力于打开从“施工受阻”到“协同完工”之间的“过程黑箱”, 实现从叙事描述向机制解释的跨越。

基于网络治理理论, 本文构建包含“主体-结构-机制”三个维度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用以诊断治理网络的断裂状态与修复路径。主体维度识别四类关键节点——政府(街道/村委会)、村民、企业(区建筑公司/本地施工队)、第三方(环保协会、监测站、监理公司), 重点关注节点是否“在场”、角色是否清晰、资源与能力是否匹配。结构维度刻画三类关系链的联结状态——行政链(正式权责传递)、情感链(信任与

认同关系)、利益链(资源分配与协作),通过分析联结的数量、强度与方向,判断网络结构呈“星型辐射”还是“网状互动”。机制维度诊断四类协调机制是否耦合——信任机制(历史承诺是否兑现)、价值机制(环保目标是否与生活意义对接)、信息机制(政策话语是否完成乡土转译)、动员机制(利益诉求是否有制度化出口),四链同步畅通是网络有效运行的基础。

框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当主体参与不足、结构断裂或机制失调时,网络陷入“失灵均衡”;唯有通过节点补位、联结重建与机制再耦合,方可转向“协同均衡”,实现治理绩效提升。

为直观呈现网络结构的转变,本文绘制了干预前后的网络结构对比示意图(图 1)。干预前呈现“星状结构”:街道节点居于中心,通过单向箭头连接村委会、村民和企业等边缘节点,各边缘节点之间缺乏横向连接通道。干预后呈现“网状结构”:街道、村委会、村民、第三方机构等节点之间以双向箭头相互连接,信任链、价值链、信息链、动员链同步接通,形成密集的互动网络,体现了横向连接的重建与四链耦合的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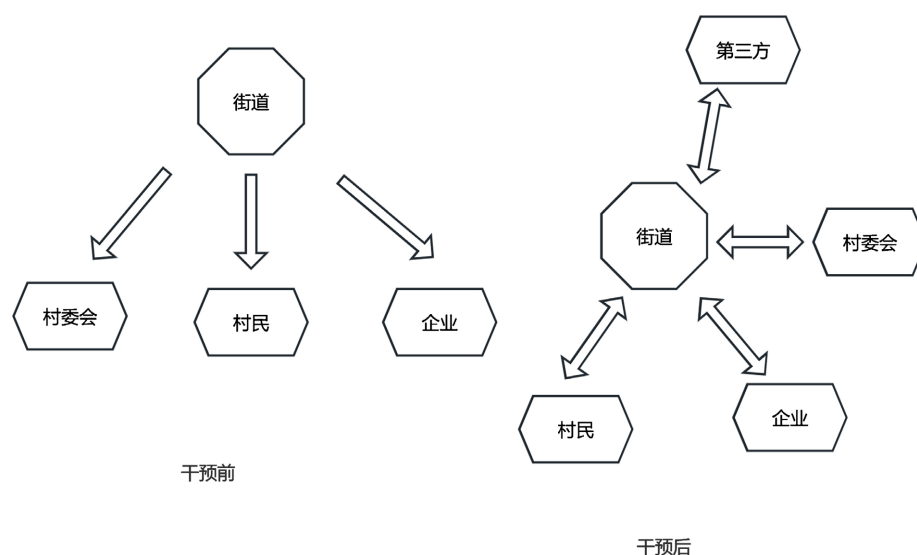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mparison of network structur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图 1. 干预前后的网络结构对比图

为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文采用多源资料三角互证法。深度访谈材料通过半结构访谈 42 人(街道干部 12 人、村民 20 人、施工方 6 人、第三方代表 4 人),形成转录文本约 25 万字,重点获取主体动机、互动细节与认知变化。项目档案文献收集工程台账、会议纪要、协调记录等 PDF 文档 47 份,用于还原决策过程、协商轨迹与责任分工。环境监测数据获取区环境监测站 2024 年第四季度至 2025 年第三季度 COD、氨氮等指标的月度数据,客观评估治理成效。社交媒体与实地记录截取村民微信群互动信息 12 条,辅以调研笔记,捕捉非正式舆论与情感动向。“村民满意度”数据通过项目末期问卷调查获得。问卷围绕施工质量、沟通充分性、诉求回应及时性三个维度设计(李克特 5 级量表)[15],由调研员在村干部陪同下入户发放并回收,共发放问卷 182 份,回收有效问卷 176 份。所有关键事件均需至少两类资料交叉验证,不一致处通过回访与多方核对进行校准,确保叙事真实、因果可靠。

本文选取粤西 M 市 A 街道 B 村雨污分流改造项目作为案例,主要基于典型性和极端性的考量: B 村面临管网老化、财政依赖、信任赤字等多重困境,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政府热、村民冷”现象的缩影,其问题结构具有普遍意义;2025 年 4 月发生的施工协调事件规模较大,呈现“强分歧-快反转”特征,为深度追踪网络“断裂-修复”全过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经验素材。该案例雨污分流项目

动工首日即因村民集中表达意见而施工受阻, 工程陷入停滞, 治理网络呈现三重断裂: 主体层面, 政府单边决策, 村委会中介功能弱化, 村民被排斥在决策之外; 结构层面, 信息单向传递, 情感链断裂, 利益链尚未建立; 机制层面, 信任赤字、价值错位、信息梗阻、动员缺失。面对困局, 街道系统性启动网络重构: 信任修复, 项目负责人公开道歉, 承诺台账公示; 结构重建, 设立每周“村民说事会”, 推行动态管理; 机制再耦合, 方言科普转译技术话语, 劳务分包疏导利益诉求, 微信群建立即时信息闭环。在 46 天的时间内, 完成从施工受阻到协同推进的转变, 支流水质从劣 V 类提升至 IV 类, 村民满意度上升 63 个百分点。这一转变并非单一措施的结果, 而是节点补位、联结重塑与机制协同共同作用的产物。

4. 执行过程中的协调困境: 网络治理视角下的三重断裂

以 B 村施工受阻事件为切入点, 采用“主体-结构-机制”三维分析框架, 对雨污分流改造初期的执行困境进行网络治理诊断, 发现多元治理主体由“协调缺位”逐步走向“公开分歧”, 呈现了主体缺位→横向连接断裂→四链同步失锁, 验证了“星状结构→失灵均衡”的生成链条。

4.1. 治理主体参与不足导致节点离散与网络空心化

项目启动初期, 以政府动员半月之久却遭“闭门羹”为切口, 逐项分析政府、村委会、村民、企业四类节点参与程度, 发现横向连接基本为零, 从而验证“主体缺位→星状生成”的第一道断裂: 治理网络呈现典型的“政府单节点运行”特征, 其余主体被动或主动缺席, 网络密度显著降低。

1) **政府节点: 行政包揽与横向排斥。**街道沿用“宣传-座谈-包户”传统模式, 施工方案、资金拨付、队伍选择等关键决策均在体制内闭环完成, 村民仅作为“被告知对象”。半月内仅 3 户签约, 折射出政府单边行动下网络协作基础的薄弱。

2) **村委会节点: 中介功能弱化与双向沟通不畅。**村委会主要扮演政策传达角色, 既未将村民诉求(如历史征地遗留问题)向上反馈, 也未将政策意图转化为乡土话语向下传导, 中介节点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3) **村民节点: 被动接受与信任不足。**村民被定位为“政策接受者”, 既无渠道参与方案设计, 也难以理解“COD”、“氨氮”等技术术语。环保目标与生活经验之间存在差距, 信任基础薄弱。

4) **市场与专业节点: 参与通道不足。**中标企业缺乏与村民的互动接口, 本地施工队因资质门槛被排斥在外; 环保协会、监测站等专业力量在施工协调事件发生前未接入网络, 专业支撑缺失。

4.2. 治理结构断裂表现为垂直主导与横向连接失灵

B 村座谈会单向宣读、包户只计签字、微信群信息传播不畅等场景表明, 治理结构延续“街道-村委-村民”垂直传导模式, 横向协商渠道匮乏, 网络呈现“星型拓扑”, 信息与资源流动受阻。

一方面, 信息单向传导与反馈缺失。街道沿用“宣传-座谈-包户”三段式工作方法, 信息主要沿“街道→村委会→村民”单向下传。座谈会主要宣读期限与补偿额, 村民难以就技术方案、路由调整或劳务机会提出修改意见; 包户记录只登记“是否签字”, 未充分回应“为何反对”。

另一方面, 非正式信息影响舆论。微信群、晒谷场等非正式渠道中出现“外地施工队会破坏路基”等信息, 官方信息未能及时有效渗透。横向连接薄弱, 信息失真率上升, “技术-生活”话语错位进一步加剧。

4.3. 治理机制失调导致四链同步断裂与系统困局

在主体离散、结构僵化的背景下, 信任、价值、信息、动员四重机制接连失灵, B 村治理网络的四条关键链条同步断裂, 形成“不信任-不认同-不接收-不配合”的恶性循环。

1) **信任链断裂: 历史旧账影响政府信用。**2015 年征地配套落空、2022 年燃气回填粗糙等历史问题,

使村民对政府项目的信任基础薄弱。街道 2024 年底再推动雨污分流时，部分村民持怀疑态度。

2) **价值链断裂：环保框架与生活框架存在距离。**政府以 COD、氨氮等专业指标定义水质问题，村民则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理解水环境。两种认知框架之间缺乏有效的转译与对接，环保目标在村庄层面未能获得充分的情感认同。

3) **信息链断裂：技术话语与乡土话语脱节。**官方宣传材料以专业术语为主，与村民的日常语言习惯存在距离。村委会的信息中转功能有限，非正式渠道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4) **动员链断裂：利益诉求缺乏制度化出口。**村民在施工安全、出行便利、劳务参与等方面存在合理诉求，但缺乏规范化的表达和回应渠道。个别诉求未能得到及时回应，不满情绪逐步累积。

四链断裂且相互强化——信任不足使政府信息缺乏公信力，价值错位使环保目标缺乏认同，信息断裂为不实信息提供空间，动员断裂使个体不满难以有序疏导——共同导致施工协调困局的形成。

5. 路径创新：网络治理的三维重构与机制耦合

面对执行僵局，B 村用 46 天时间实现从“施工受阻”到“协同推进”的转变，摒弃单一行政管控思维，转向网络治理逻辑，通过“主体补位－结构重塑－机制再耦合”三重路径，推动治理网络从“失灵均衡”向“协同均衡”跃迁。

5.1. 通过主体补位激活节点与重构网络角色

1) **村委会功能再造：从传达者到协商平台。**街道赋予村委会“议题编号权”与组织协商职能，建立“村民诉求台账”，重要事项须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村委会每周主持“村民说事会”，形成“说－议－办－评”闭环，首月办结诉求 47 条，其中 5 条被采纳为正式方案。

2) **村民主体性提升：从被动接受到协同参与。**街道推动村民通过说事会设置议题，并组建“质量监督小组”，对材料抽检、工艺规范、竣工验收行使监督权。施工期间，监督小组发现管材壁厚不达标并责令退换，实现了“村民监督嵌入政府工程”。

3) **专业与市场节点接入：第三方赋能与在地融合。**街道引入环保协会开展“污水浇菜实验”等直观展示活动；监理公司每日公示检测数据；本地施工队通过劳务分包参与入户工程。

5.2. 通过结构重塑构建横向连接与可视化网络

1) **动态管理：信息公开与精准对接。**街道将 182 户按强烈反对到完全同意的支持度标注为红、橙、黄、绿四色，每日更新并张贴于公共区域。图谱化管理使信息不再仅沿垂直方向流动，干部能精准研判、村民可横向对照。

2) **说事会制度化：建立常态协商接口。**每周三固定开展“村民说事会”，每项诉求编号归档，明确责任人与办结时限。活动首月收集诉求 47 条，办结 43 条，办结率 91%。

3) **档案化管理：过程留痕与责任可溯。**所有会议纪要、诉求台账、质检记录同步保存纸质与电子档案，实现过程可追溯、责任可倒查。

5.3. 通过机制再耦合实现四链修复与系统重启

1) **信任链重建：承诺台账化。**街道项目负责人就历史遗留问题作出说明，并建立“承诺兑现台账”，明确每项承诺的责任主体与时间节点，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可追溯的制度安排。

2) **价值链整合：科普与生活化传播。**环保专家将专业指标转化为村民可感知的生活化表达，通过对比实验等方式让村民直观感受水质差异，实现环保话语与生活经验的对接。

3) **信息链疏通：双向信息互动。**设立微信群信息专员，每日回应村民疑问；监测站定期发布水质数

据, 实现信息双向互动, 有效遏制不实信息传播。

4) 动员链重构: 利益疏导制度化。本地施工队通过合规分包参与工程; 因施工受影响的商户、养殖户获得相应补偿。利益诉求被导入制度渠道。

通过上述三重路径的协同推进, B 村在 46 天内实现从施工受阻到多元协同的转型, 支流水质由劣 V 类提升至 IV 类, 村民满意度上升 63 个百分点, 彰显并检验了网络再耦合对政策执行的关键作用。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粤西 B 村雨污分流项目为案例, 基于网络治理理论揭示了农村环境政策从“分歧”到“协同”的转型机制: 第一, 执行困境的本质是网络失灵。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结构僵化与机制断裂共同导致政策网络“碎片化”。第二, 网络再耦合是破局关键。通过“主体补位 - 结构重塑 - 机制修复”三维干预, 可将离散节点重新编织为协作网络, 实现政策目标与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第三, 行政主导与节点平等可兼容。在强政府背景下, 基层政府可通过“枢纽 + 平台”角色转型, 让渡协商空间、开放决策过程、共享治理收益, 实现“行政引领下的多元共治”。

基于 B 村经验, 提出以下可推广的基层治理建议:

第一, 构建制度化协商平台。应推行“村民说事会”与“诉求台账”机制, 赋予村委会组织协商、编号督办职能, 确保民意进入决策闭环。具体操作上, 可将每周固定一天设为说事日, 每项诉求编号归档、明确责任人与办结时限, 形成“说 - 议 - 办 - 评”的完整闭环。B 村的实践表明, 此类机制能够有效将分散的个体诉求整合为可回应的治理议题, 首月办结率达 91%。

第二, 推行可视化治理工具。应推广动态管理方法, 实现户情可视化、进度透明化、责任公开化, 以提升治理精准性与公信力。具体做法是将农户按配合程度分类标注为不同颜色, 每日更新并公示于公共区域, 使治理信息从单向传达转向双向可见。这一工具的意义在于, 既帮助干部精准识别重点沟通对象, 也便于村民之间形成横向参照与相互监督。

第三, 建立利益疏导与补偿机制。应优先将辅助工程分包给本地合规队伍, 设立快速补偿通道, 将分歧性利益转化为合作性收益。具体而言, 对于因施工受影响的农户、商户、养殖户, 可参照 B 村经验建立分类补偿标准与快速响应流程; 对于本地劳动力, 可通过合规分包方式吸纳参与辅助工程建设, 使村民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利益相关者”。

第四, 嵌入第三方专业节点。应在项目前期引入环保组织、监理机构等第三方力量, 通过数据公开、独立监督等方式, 增强政策说服力。B 村引入环保协会开展直观科普活动、监理公司每日公示检测数据的做法证明, 第三方的专业性与中立性能够有效弥合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认知差距, 降低沟通成本。

第五, 重视“小事治理”与情感联结。应从学生接送、临时出行等具体民生需求入手, 通过细节服务积累信任资本。B 村的经验表明, 村民的不满往往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不便而非宏观政策取向, 因此及时回应这些“小事”比大规模宣传更能赢得群众认可。基层干部应将“小事治理”纳入工作常规, 而非仅作为应急手段。

上述建议侧重于制度设计与操作原则。其核心价值在于将网络治理从理论话语转化为基层干部可对照、可检查的实践指引, 使“主体补位”、“结构重塑”、“机制再耦合”三重路径在具体情境中具备可评估的中间目标, 从而提升经验的跨情境可复制性。

7.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单案例的过程追踪, 虽在深度和机制阐释上有所优势, 但 B 村案例的成功修复有其特定的情境条件: 一是村庄内存在可吸纳的本地施工力量, 为利益疏导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是村委会在干预

后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三是环保督察形成的时限压力为各方迅速达成共识提供了外部动力。若上述条件缺失，网络修复的周期和路径可能需要相应调整。

未来研究可通过多案例比较，选取不同区域文化、经济水平和治理传统的村庄，检验本文所提炼的“主体补位－结构重塑－机制再耦合”框架的适用边界，并探索在不同情境下网络修复路径的差异化特征，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三权分置’下耕地保护权责均衡机制构建与对策建议研究”(19YJA630009)。

参考文献

- [1] 于法稳, 于婷.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及对策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19(3): 6-17.
- [2] 崔艳智, 贾小梅, 黄亚捷, 等.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J]. 中国环境管理, 2022, 14(3): 54-59.
- [3] 夏换, 陈彦全. 行政调度: 督察驱动执行的行政机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 39(4): 106-113.
- [4] 张翔. 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何以可能——基于“智慧 T 市”项目执行过程的个案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 39(9): 124-131.
- [5] 于法稳.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9(2): 80-85.
- [6] 崔艳智, 黄亚捷, 李君超, 等. 新时期京津冀农村生活污水协同治理实施路径[J]. 中国环境管理, 2025, 17(1): 30-39.
- [7] 陈颖, 董旭辉, 王亚男, 崔艳智.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重点与难点解析——《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解读[J]. 环境保护, 2019, 47(1): 18-22.
- [8] 陈思丞, 阎颖超, 赵家鑫. 政策网络与创造性执行效能——基于丁省 M 村盐碱地改良政策执行过程的历时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5): 16-27.
- [9] Provan, K.G. and Kenis, P. (2008) Modes of Network Governance: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 229-252.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m015>
- [10] 鄞益奋. 网络治理: 公共管理的新框架[J]. 公共管理学报, 2007, 4(1): 89-96.
- [11] 张鸣鸣, 于法稳.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 生态经济, 2023, 39(5): 196-203.
- [12] 李维安, 林润辉, 范建红. 网络治理研究前沿与述评[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17(5): 42-53.
- [13] George, A.L. and Bennett, A.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T Press.
- [14] Yin, R.K. (2018)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6th Edition, SAGE.
- [15] Likert, R. (1932) A Techniqu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Archives of Psychology*, 140, 1-55.